

做好党的创新理论对外传播

李铁军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中国理论不可缺席；中国理论要走出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势必先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性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又为全人类和平发展提出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载体是习近平著作，习近平著作的对外翻译传播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举措。

借鉴理论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历来十分重视理论对外传播工作。自建党以来，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进步力量的广泛关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党的部分重要文献很早就开始被陆续译介到国外。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系统组织毛泽东著作的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毛泽东著作的对外翻译和广泛传播，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宣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而且还扩大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创造了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理论对外传播的一个高峰。

毛泽东思想国际传播实践的历史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有力。对外译介毛泽东著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宣战略的重要抓手，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领导人都亲自参与此项工作顶层设计。中央统筹协调相关机构和各方面力量，先后指示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等专门机构，打通了翻译、出版、发行等各环节，最大限度发挥各方优势，形成合力。毛泽东还亲自为翻译理解上的一些难题答疑解

惑。二是坚持质量优先，重视翻译团队建设。毛泽东著作外文版的广泛传播与高水平的翻译质量密不可分。从《毛泽东选集》翻译开始，中央就高度重视高水平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and 翻译质量管理，从全国抽调各领域专家学者和外语人才组建专门翻译团队，吸纳优秀外国专家参与文稿润色，既注重忠实完整传达著作内涵，保留毛泽东个性化语言风格，又保证了译文地道性和可读性，尽可能消除文化和语言差异带来的理解偏差。三是坚持需求导向，适时调整传播内容。在对外译介毛泽东著作过程中，受众需求成为确定出版选题的重要坐标，国家出版机构有意识地将传播对象国民众的需求和阅读习惯，把握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契机，策划不同主题的单行本和选编本，在提高关注度和吸引力的同时实现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四是坚持因地制宜，实现发行本地化。充分利用对象国本土和民间出版发行渠道，在短时间内扩大了毛泽东著作的发行范围和影响力。

尊重现代传播规律

树立精准传播理念。要提升理论传播效能，必须注重精准传播、有效传播，精准识别特定受众群体，精准选取传播方式，精准择定传播时机。要适应现代传播分众化、差异化的趋势，创新传播方式，做到多样化、个性化、有针对性，比如可以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多语种权威译本电子版，通过国际图书发行渠道全球发行，通过双边多边国际外交平台、政党交流平台、民间人文合作平台、智库合作平台等多种方式进行定向发布等。传播时间节点可以动态选择配合重大国际活动、双边外交活动、党际交流活动等。

树立系统传播理念。要从全党工作大局的高度系统谋划，树立系统传播理念也就是大传播理念，综合运用国内和国际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

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是理论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理论宣传战线要全力以赴，更要求树立大传播理念，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构建系统高效的大传播工作格局。要坚持系统思维，理顺打通内宣外宣，全社会、全系统、全平台、全载体发力，真正把我国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和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

树立案例传播理念。所谓案例传播，就是讲故事。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对外传播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纯粹理论输出。这一思想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事业的创造性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每一个理论成分背后都有着鲜活的实践支撑，都能找到生动的实践案例。在对外传播工作中一定要充分挖掘这些实践案例，比如蕴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案例、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理念的现代治理案例、为全人类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摆脱贫困案例、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案例等，通过讲述这些蕴含中国观点、体现中国立场、彰显中国智慧、弘扬中国价值的生动故事，让国际社会更加深切地感知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

主动谋划推动中文走向世界

文化传播和理论传播均以语言为载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当前国际舆论场占据相对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语在国际交往和国际传播中的主导地位。中华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有着深远

的历史影响，我们也拥有中文国际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艰苦奋斗，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和中国理论走出去正当其时，推动中文再次国际化也势在必然。

突破国际交往和国际舆论场英文一语独大的现状，提高中文国际化程度，应该是一个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久久为功的过程。

第一，要充分发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引领作用，用先进的中国产品、优质的中国服务、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引领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为中文的国际化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树立产品优先意识，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用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视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文旅娱乐产品、文化创意产品来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为中文国际化奠定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基础。

第三，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方位对外开放，包括文化市场、旅游市场，特别是教育市场的对外开放。扩大优质教育服务出口是促进中文国际化的重要抓手，通过中文教育塑造中国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能够直接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认同度和中文的国际普及率。

第四，要全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将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形象优势，将中国的组织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形成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必将推动中文走向世界。



奎光书院位于江西省铜鼓县定江上游永宁镇城南路15号。同治《义宁州志》记载，奎光书院系“客籍”居民捐资创立，建于清道光年间，地址在城南棉花崙，置田租千数百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科举办学堂，改革后的奎光书院顺应时代变迁，调整课业内容，传播进步思想文化，为秋收起义培养了大量革命人才，成为秋收起义过程中的军事指挥所，并保留了大量红色标语等革命遗迹，成为当代红色革命教育的重要基地。起义期间，毛泽东在奎光书院等铜鼓县革命据点对中国革命道路作出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探索和引兵井冈山的决定，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为秋收起义打下革命基础

近代以来，奎光书院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治元年本《奎光书院志》统计，该书院共培养出了10名进士，59名举人。良好的教学传统和学习氛围让奎光书院成为近代江西重要的教育场所之一。但随着晚清社会急剧变革，救亡图存代替科举取士成为奎光书院学子新的追求。在奎光书院接受新式教育的陈葆元、陈逸群等毕业生，都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秋收起义乃至中国革命的重要人才力量。

其中，陈葆元出生于1902年。1920年夏，18岁的陈葆元在奎光书院接受了新式教育后逐渐转向革命。毕业之后，他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这里，他与方志敏等成为校友，并通过他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向导》等革命文献，立志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25年7月，陈葆元根据中共直属南昌支部的指示，回到铜鼓县组建党支部，筹备赣西根据地建设。

回到铜鼓的陈葆元成为母校奎光书院的一名教师。同时，利用奎光书院在铜鼓县的文化影响力，陈葆元以奎光书院为据点，秘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发展党员。其中，发展和争取的对象就包括他在奎光书院的同学李秀、陈逸群、赖怀恒、李建康、赖益躬等人。经过多番努力，1925年赣西根据地第一个党支部在奎光书院成立，陈葆元任支部书记。

在铜鼓党支部的鼓动下，当地工农群众的反抗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在此背景下，长期在铜鼓发展工人运动的支部党员陈逸群，领导成立了赣西北第一个工会、农会。1927年4月，陈逸群当选铜鼓县总工会常务委员，6月任中共铜鼓县委书记。在他的努力下，秋收起义前铜鼓县成立了大量各级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组织，为秋收起义在铜鼓的爆发奠定了群众基础。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独立团进驻铜鼓，并在奎光书院驻扎。陈逸群立即与之取得联系，并引导这支革命武装打开铜鼓县监狱，救出被捕的刘志先、陈奉南、李名开等100余名革命同志，接着又将铜鼓首恶分子的住宅付之一炬，并同革命军一道深入乡村围剿反动武装，沉重地打击了铜鼓的反动势力，为毛泽东亲临铜鼓领导秋收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秋收起义的指挥所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34岁的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湖南省委的决定和安源军事会议的部署，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前往铜鼓亲自指挥秋收起义。

1927年9月，毛泽东历经艰险抵达铜鼓后得知驻扎在修水和铜鼓的革命军部队已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毛泽东就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基础，下设的第一、第三团建制不变，将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第三团。其中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第一营部就设于奎光书院，奎光书院也因此成为秋收起义设在铜鼓的重要指挥所。改编完部队之后，毛泽东还多次来到奎光书院等地看望、慰问部队官兵，检查起义准备和训练情况，并在奎光书院与全体干部共进晚餐，商讨秋收起义需要注意的问题。

驻扎在奎光书院等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正式打出工农革命军的军旗，以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发动秋收起义，向湖南浏阳进发。在革命风暴中，毛泽东心潮澎湃，写下了著名的

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基地

徐佳佳

《西江月·秋收起义》。其中有两句“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表明此次起义已有了属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部队名称和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秋收起义部队从奎光书院等地出发攻打浏阳，起义失利后又回到铜鼓。毛泽东在铜鼓思考了三天三夜，他和红军将士们认真总结起义攻打城市的教训。就在铜鼓，包括在奎光书院，毛泽东开始了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艰难探索。从铜鼓到井冈山，中国革命的重心从攻打城市转变为争取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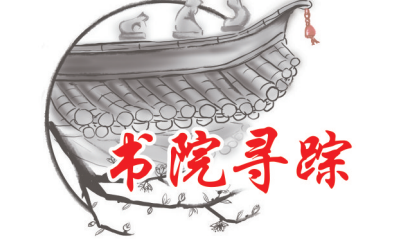
红色标语传承秋收起义红色基因

秋收起义前后，为传播革命主张，发动群众参加起义，铜鼓县中共党组织、红军队伍以及各种革命团体在奎光书院刷写了大量对联、口号、标语等标语。这些红色标语保存至今，成为传承秋收起义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其中，工农革命军驻扎奎光书院前，铜鼓县党组织等就在整个奎光书院内壁、外墙上写下“红军万岁”“打倒土豪劣绅”等大量红色标语，发动群众参加秋收起义。1927年工农革命军第三团驻扎在奎光书院时，为做好战争动员，部队在奎光书院内门、墙上又刷写了“南昌暴动”等革命标语。

秋收起义后，关注到毛泽东率领革命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彭德怀果断提出要以井冈山为旗帜和榜样，向井冈山进发。1928年，他率领红五军从湖南多次转战铜鼓，其间红五军政治部就驻扎在奎光书院。该院院墙上刷写的“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土地政纲”等文告标语，就是当时红五军向当地群众传播革命主张的历史见证。2016年，铜鼓县被列为江西省红色标语保护利用试点单位。全县遗留下来的红色标语共有122条，其中大部分来自奎光书院。奎光书院已经成为赣西北地区保存最多、保护较完好的一处重要革命标语旧址。这些红色标语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起到了凝聚革命力量的作用，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它所传递出的精神力量在当代仍具有教育意义。

当古代书院与现代革命相遇，奎光书院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人才、场所等助力，并在新的时空下继续传承着红色基因，展现出古代书院在当代的文化勃勃。



君子“求达不求闻”

胡发贵

“求达不求闻”，是孔子赞赏的立身行事的信念和原则，其间也包含了孔子所期许的君子品性与特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述：子张问孔子，士怎样做才可以称得上“达”呢？孔子反问道：你所问的“达”何所指呢？子张回答说：我理解的“达”，是知名于国家，知名于乡邦。孔子说：这是“闻”啊，哪里是“达”。孔子强调，“达”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而“闻”则与此大相径庭，是“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从文意来分析，“闻”指名声、令誉等社会知晓度，而“达”则指“质直好义”，涵摄道德的成熟和品格的完善之意。诚如朱熹所注：“达者，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显然，“达”是向内的，追求的是自我的成长与“成人”。故朱熹又说，“达”要在“主忠信”，行为合宜，谦虚低调，处事慎重，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与此相对，“闻”则是向外的，务求人知，博取名声，其间难免务虚矫饰，表里相违。

“达”与“闻”有此迥异，故孔子舍“闻”而取“达”。他反复强调君子不应汲汲于求知于他人，不要

在意所谓名声的有无和大小。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应反省、自责自己的能力不够，而不要担心、顾虑不被人知，更不应焦虑自己的名声不足。“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孔子甚至认为不被人知而淡定自如，不愠不怒，才是真正的君子。显然在孔子看来，求“达”的君子，是内在自足的，无须外求干誉；求“达”的君子也是内向务实的，故也无意于外在的虚名。因此，孔子特别主张君子应忠厚笃实，少说多做；君子还应言实相符，言行应一致，言而过其行，在君子那里是可耻的；孔子尤其要求，作为一个君子，不仅要做到言出有物，做不到的不说，说的则必须做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所谓“无所苟”，即意力成虚浮，更拒绝为了所谓“闻”而虚张其词，夸诞其语。

从《论语》可见，孔子对于自炫之类求名的花言巧语，极为反感，也十分鄙弃，斥之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文中的“巧言”，按朱熹的注解，即“好言”，不过此非好坏之好，而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的讨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夸夸其谈，以哗众

取宠。

孔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君子应求“达”不求“闻”，在逻辑上与他倡导的君子“为己之学”密切相关。“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儿的“人一己”之分，非如一般意义上的“人一我”之别，其所谓“为己”，非谋一己之私利和好处，其所谓“为人”，亦非为他人着想的奉献。在上述语境中，“为己”即实事求是做，治学是为自己的学问和道德进步，而“为人”，则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即只意在邀誉而已。“为人、为己”之分，表面上谈的是治学，其实际的是如何做人，特别是如何做一个君子一样的人。孔子借古讽今，欣赏的是“为己”，鄙薄的是“为人”，而前者是“君子”应有的品性，后者则是“小人”的机巧和敷衍，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所谓“求诸己”，在孔子的思想中，首先意味着主动而自觉的追求道德之善，这种追求不是外加的，更不是被迫或受利禄诱惑的，而是自觉自愿的，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其次，“求诸己”意味着乐观进取，“为己”之学不在博取外在的名声或功利，而专注于“闻道”和“怀德”，寄意于“为圣

成贤”，故洋溢着向上向善的追求，它是充实而快乐的。孔子曾生动地形容这种追求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以至都忘了生命的年轮，不知不觉老了都没意识到。可见，“求诸己”的迷人之处。再次，“求诸己”还意味着严于律己，时刻坚守君子的操守与德行，而绝不会在外在虚荣牵制和左右下，俯仰迎合、弄虚作假的表里相背。因为，君子“求达”而学在“为己”，必然要求内在的真实和诚实，即“吾日三省吾身”，在毫不松懈的自我检视、反思中，坚定而始终的严于律己。不论处在何种情形下，也不论身处何种境况中，“求达”的君子，会自觉为仁，并且时时刻刻以此为信念，不在意浮名，不在意虚誉，永远做个真诚、纯粹的人。在我看来，这就是君子“求达不求闻”的底蕴，也是社会对君子立身行事的现实而迫切的期待。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